

理性與自由

文化思想批評論文集

胡繩著

華夏書局發行

理與性自

胡繩著

華夏書店發行

理性與自由

基本定價七元

著者

胡

繩

發行人

韓

近

庸

出版者

華夏書店

上海北京西路六四二號

電話三六〇〇九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出版期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版

(3001—5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序 言

收在這個集子中的長短論文共十五篇。其中「論反理性主義的逆流」寫於一九四〇年年底，最早的一篇「論歷史研究和現實問題的關聯」寫於一九四四年年底。除了「評馮友蘭著新世訓」一篇是在桂林寫的，其餘都寫於重慶。

一九四〇年年底我在重慶開始注意到國內思想界中的很不健康的一些趨向，這些趨向似乎可以歸納在「反理性主義」這一個概念中，牠和民族解放戰爭的要求是斷然相違背的，於是我簡單地寫了「論反理性主義的逆流」一文，發表在「讀書月報」上，正在這一期刊物出版時，一個震動國內外使人痛心扼腕的事變發生了。原來這種思想界的趨向並不是無因而生的。在這同時，我又讀到了馮友蘭先生著的「新世訓」。對於馮先生，我一向是非常欽佩的，但對於這本書中所論，不能不感到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直到一九四二年在桂林時我才有機會寫了一篇書評，在桂林出版的「文化雜誌」上發表。以後又回到重慶，在一九四三，四四這兩年中，陸續寫出了其餘的各篇。

我把這十六篇文章分成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於反理性主義思想傾向的批判。第二部分是集中於復古傾向的批判。這兩個部分事實上是相互關聯的，反理性主義在中國所找到的最好掩護就是復古，而向封建專制主義時代倒退的傾向自然是和開明的理性對立的。第三部分是對馮友蘭先生的兩本

著作的批評。我不把對馮先生的批評和前面兩部分編在一起，因為我覺得，在這裏面是應該有所區別的。

把這幾篇文章編在一起重印的原故，是因為：第一，八年的抗戰時期在中國的政治社會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段落，同樣的，在文化思想發展史上，我們也將不能忘記這抗戰中的八年。這八年中的政治社會中的複雜變動也適當地反映到了文化思想上面。這幾篇文章雖然不能照見戰時文化思想的全面，但是這一角的反映也不是不值得回顧的吧？而且第二，八年的抗戰是對於中國民族的大播動。經過這次播動，民族的新的生命開闢了發展的道路，腐朽的沉渣也同時泛起了。戰爭時期是過去了，新的生命必須繼續排除萬難而大踏步前進，也就必須把這些浮起的沉渣撇清。這本書中所論及的反理性主義，復古主義的傾向本不是抗戰期間才開始，也顯然不會隨抗戰的結束而消逝。今後在民主的道路上，中國民族新文化必將展開健康的新時代，對於這些舊時代的沉渣的清算也就不能不繼續進行。

這一些文章雖然在不同時候陸續寫成，但是在總的意義上是可以概括在「反理性主義的逆流」一文中的這幾句話中：

「我們要堅持科學的精神，堅持思想的自由發展，堅持合理的思考，從這裏面培植我們的遠大的理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反對一切盲從與獨斷，打碎一切反理性主義！我們一方面要反對因襲的傳統的成見，一方面要排斥西方腐敗思想的傳染，而……充分發揚清醒的，科學的，現實的理性主義！」

我深信，今後的中國文化發展依舊是和五四時代一樣要在科學與民主的大旗下前進。科學的基本精神是理性，也就是尊重事實，尊重合理的思考；民主的基本精神是自由，也就是要使千百萬人民大

衆獲得自覺的機會和思想的自由。假如在這本書中不但是「破」，而且也有所「立」，那麼我所企圖的就是保衛理性，保衛自由。我也深信，只有在理性的講壇上發揚自由的批評，那麼中國文化思想的前進發展才是可能的。因此我編集起這幾篇文化思想的批評論文，而以「理性和自由」做這本書的題目。

一九四六·三·一。

目次

序言

論反理性主義的逆流……………(一)

一個唯心論者的文化觀……………(一〇)

思想的漫步……………(一七)

一、關於人本主義

二、「不變」的倫理

三、人的尊嚴

四、人的覺醒

這就算是「批評」麼？……………(三八)

是聖人還是騙子？……………(五二)

*

*

*

評錢穆的「文化與教育」……………(六六)

論歷史研究和現實問題的關聯……………(八七)

歷史能夠證明中國不需要民主麼？……………(一〇一)

什麼是世界文化的危機？

(一一六)

論「誠」

(一三二)

*

*

*

評馮友蘭著「新世訓」

(一四八)

評馮友蘭著「新事論」

(一七六)

論反理性主義的逆流

一

譚平山先生最近在一個雜誌中發表了一篇「紀念 國父中山先生誕日並敬告青年」的論文，在這裏面，他向青年提出了幾點「最值得注意的問題」：「第一，必須有遠大的理想」，「第二，要有實際的精神」，「第三，不盲從，不迷信，反對獨斷」，……他說：「在中國社會中，有種種的束縛；阻礙着青年思想的前進，不容青年懷有遠大的理想。一方面是保守的封建勢力以因襲的成見，獨斷的教條強迫青年接受，要青年照着老樣子去生活，對一切不合理的現象處之若素，不許懷疑，對權威者的一言一動，盲目的信從，而不許問：爲什麼？青年要有遠大的理想，開闊的胸襟，必須打破這種束縛！……」

破除盲從與迷信，推翻獨斷的教條，從現實中確立遠大的理想，在實際中作實事求是的努力，這是代表着一種什麼精神？是清醒的，現實的理性主義的精神。

我們的抗戰是正義對非正義的鬥爭，是人類的理性對反理性的鬥爭。因此，在我們的抗戰中所發展起來的思想文化潮流，其基本的方向，應該是理性主義。

理性主義要求科學，因為科學的精神是實事求是，這是迷信的對立物；理性主義要求思想的自由，因為自由才能保證思想的活潑發展，這是治療獨斷的聖藥；理性主義要求合理的思考，而所謂合理就是要求邏輯與現實的一致，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一切愚昧的盲從從根基上剷除淨盡！

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化思想在其發展向上的時期，都是理性主義的，而當它表現反理性主義的傾向的轉化時，也就表現出了它的沒落崩潰。「近代歐洲的文化」，——如譚平山先生所說，「是在反對了中世紀的頑固的教條之後才發達起來的，所以英國近代的第一个大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首先提出要打破偶像與成見的主張。」十七十八世紀的西歐文化是理性主義的（注意，這里所說的理性主義與說到經驗論與理性論的對立時的理性主義含意有廣狹之不同。）但是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隨着資本主義的向上時期的過去，隨着獨佔的資本主義階段——帝國主義階段的到來，隨着西方的資產階級已成為不是助長而是阻止歷史的更新發展的勢力，於是在文化上也崛起了反理性主義的思想，這種反理性主義表現在哲學上就是直覺主義，神祕主義，唾棄客觀的觀察與思考而推崇朦朧的直覺與盲目的意志；表現在政治思想上就是對民主政治的懷疑，而以馬基佛里的唯力主義為聖經；表現在經濟思想上就是庸俗的效用價值說等等。法西斯的思想是反理性主義思潮的集大成者，也就是近代思想最反動的一個表現。

我們在實踐上以民族自衛的正義戰爭來反對法西斯的侵略戰爭，因此我們也要在思想上發揚理性主義來反對反理性主義。也因此，我們就更更嚴密檢查在我們今日的論壇上由於外在內在的某些條件

而形成的某些「反理性主義的傾向，加以及時的克服，因為這是有損於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的！」

二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的詩人——所謂未來主義的藝術的創始人——馬利納諦（Marinetti）曾經歌頌戰爭說：「戰爭是美麗的，因為牠建立了力與平靜的諧和」；「戰爭是美麗的，因為牠使槍聲大炮聲，休止時的沉默，以及腐爛時的芬芳的氣味，都諧和起來了」；「戰爭是美麗的，因為牠創造了新的建築術，例如巨大的軍用車輛，飛機飛行時的幾何學以及焚燒着的村莊中的螺旋形的黑煙」；「戰爭是美麗的，因為牠使男人的身體更加年輕，女人的身體更加可愛」；等等等等。無須解釋，這位「藝術家」正是「法西斯就是戰爭」這格言的最忠實的奉行着，所以他把他的「新美學」建立在戰爭上，而歌頌着尸身腐朽的「芬芳」，和村莊焚燒時的黑煙的「美麗」。

法西斯主義者這樣地歌頌戰爭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對於他們，除了戰爭，沒有任何出路，沒有任何更遠大的希望。但是假如我們也跟着大聲喧嚷道：目前是「大戰國」的時代，一切都爲了戰爭，除了戰爭，沒有任何別的，那是什麼意思呢？請看這樣的話和法西斯瘋狂的囁語有什麼差別：「眼見歐洲已踏上一大一統的門限，將來的世界大戰恐怕是大陸與大陸的戰爭，所趨的最後方向是以武力得來的全世界大一統」；「體魄健全的當政男兒不能不拿起槍來，準備二百年的苦戰，大戰國的時代只允許大戰國的作風，大戰國的作風只有二字——（一）戰！所以和平不可能，和平乃下次戰爭的準備。……」「愚蠢的俗人們，莫以爲宇宙是一和平的機構，莫希冀世界大同，世界大同只有在我們的武力

統治上才能實現」。(散見「戰國策」各期)(註)這些話若出於希特勒墨索里尼與日本軍閥口裏是瘋話，而出於我們的教授們的口裏更只是夢話！

難道我們看不出來，法西斯侵略戰爭恰恰不是美麗的，而是醜惡的；人類的文化的繁榮發展恰恰不是依靠殺戮與破壞，而是依靠自由與和平？難道我們看不出來，我們的抗戰恰恰不是爲了戰爭而是爲了消滅侵略的戰爭，這才是正義的戰爭，值得歌頌的戰爭？難道我們看不出來，恰恰就在目前的全世界的戰火瀰漫中，已顯露了人類的永久的和平自由幸福的文明的道路？我們中國人民浴血苦鬥正是爲了實現這一道路，我們有這樣偉大的理想，所以我們才能實現這眼前的鬥爭。

三

法西斯主義者高捧尼采，我們的學者也高捧尼采。尼采說：「愛和平吧，因爲和平是對於新的戰爭的準備，短時期的和平是比長時期的和平更可愛的。我勸告你們，不要工作，而要戰爭」。所以戰國策論客也說：「和平乃下次戰爭的準備」，而把戰爭當做時代精神的「母題」。尼采說：「奴隸性是構成文化的主要的必須條件之一」，所以戰國策論客也主張民衆應該像奴隸一樣地崇拜英雄。尼采說：「男人底教育是爲了戰爭，女人底教育是爲了給戰士安慰」，所以戰國策論客也要在「大戰國時代」

(註)「戰國策」是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在昆明出版的一種刊物，這裏面的撰稿人，如陳鋒，林同濟等，當時被稱爲「戰國策派」，以後在納粹德國逐漸顯露出敗象的時候，這個刊物也停刊了。

一九四六年二月。

高唱新賢妻良母主義。……

然而西方的法西斯主義者還不只是以尼采爲滿足，更想和黑格爾攀親。黑格爾——這一個偉大的辯證論者，因爲受了他的觀念論外衣的束縛，在其思想體系中，特別法律哲學的一部分表現出了反理性主義傾向。因此黑格爾一死，他的繼承者就循着兩條道路發展：一方面，人們接受了他的辯證思想，發現其合理的核心，把它的整個體系加以一次顛倒，使之成爲現實的鬥爭武器；另一方面，人們發揚了他的反理性主義的思想要素，用直覺主義來解釋他的辯證法，閹割了其中革命的要素，使之成爲神祕的東西。所謂新黑格爾學派正是做着後一方面的工作。西歐的在沒落中的市民層就利用了黑格爾的顯赫的名字，而用新黑格爾主義的精神來對抗對於黑格爾思想的革命的改造與發展，這種辦法在我們這裏居然也發生了反響。

賀麟教授在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就特別引證了德國克洛那（Kroner）教授的話：「黑格爾是最大的非理性主義者或超理性主義者，也可以說黑格爾是理性的神祕主義者」；且加以詮釋說：「此語頗傳得現代許多黑格爾學專家的贊許，蓋最近的趨勢皆欲糾正前此認黑格爾爲純理性主義者或泛邏輯主義者的偏誤也」。接着他又引證哈特曼（Hartmann）教授的話說：「……無論在任何情形下我們也不能否認辯證法中有曖昧不明處，神祕莫測處。此顯係出於天才，雖可修養，但難於模仿。它實是一種特有的原始的內心洞觀，而且是一種高遠的洞觀……」於是賀麟教授也跟着說：「黑格爾自己承認這是一種洞觀，是一種有神祕意味的思辯的真理。但是所謂神祕的非是反理性的，不過此種由物的正面究極到其反面，由物之對立而洞觀其統一的直觀，非一般形式的分別的理智作用所可了解罷了」。儘管他聲明並非反理性的，但用「直覺」與「洞觀」來解釋黑格爾，豈不正是把黑格爾思想

反理性主義化了麼？（賀麟教授文見時代精神三卷一期）

不能否認的，黑格爾的著作中有許多神祕主義的色采，但這並不是他的思想光芒之所在，而恰恰是掩蔽其光芒的黑霧。現在，所謂「黑格爾復興運動」卻並不在於去真正發揚黑格爾的思想光芒，而是企圖把這神祕主義的霧罩得更濃，想使辯證法永藏在這霧中，以消蝕牠的革命性，因此，這也就是企圖以黑格爾的反理性主義的發展來虐殺黑格爾的理性主義的發展。西歐在沒落中的資產者早已做過這樣的努力了，但並沒有得到什麼足資誇耀的成績，中國的學者揀拾其唾餘，有什麼光榮呢？

四

「戰國」派的林同濟教授最近又發表了一篇洋洋大文，叫做：「第三期的中國學術思潮」，據他在這篇文章中分析，從五四以來，現代中國學術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民八到十八年，「叫做經驗實事時代」，以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大綱」爲開山之作，第二階段是從民十八年以後，是「辯證革命階段」，以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出版發其端。而現在，是要準備踏進一個新的階段了。關於林先生對過去中國學術思潮的階段劃分與其認識，實在很有問題，這且不去說它，只看他心目中所要展開的新階段到底是怎樣的呢？於是我們就劈面遇着一大套的玄妙的論證：「乃是一種嶄新的作法，迫近一種鳥瞰的姿勢，代表航空時代的一種作風，有如列禦寇乘風而行，兩萬尺下，山川陵谷，高低斜平，歷歷在眼底，呈湧出一幅渾成圖畫，自有它的「母題」Motif，它的整個骨相的」。真是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常道」，所以林先生也說：「我無以名之，欲名之曰文化綜合

Cultural-synthetic 或文化攝相 Cultural Configurative 時代」。讀者恐怕簡直就不知道這是在說些什麼，請略加以詮釋。

原來當今之世，戰爭有所謂「全體性戰爭」，國家有所謂「全能國家」，於是見獵心喜，文化也不妨來個「全體性的文化」或「文化的全體觀」了。這是其立意的由來。但怎樣把握這「全體」呢？本來對一個民族文化不要作片面的局部的觀察，而要認識其總體與全面，是不錯的。辯證唯物論者從來沒有企圖以局部的把握代替全面的認識，而正是要通過分析把握豐富事實而加以系統的綜合。但林先生認為這樣不行，他要高高超出於雜多的事實之上，而用慧眼的一瞥來洞澈於上下古今。這確是相當神祕而難以言傳的，所以林先生不得不借助於種種譬喻來說明他的見解，甚至借助城隍廟中看相先生來打比。原來他所謂「攝相」的「相」即「看相」的「相」也。據說是看相的，雖也看你的面貌骨骼，但他還要看出超乎面貌骨骼以上的神氣，怎樣才能看出這個呢？——那就不能不借助於賀麟教授所說的「高遠的洞觀」，「神祕的直觀」了。林同濟教授自己也說，要認識整體「不是加減乘除問題，乃是靈機神會問題」，因此才要「航空」，而且越高越好！因此才要脫離了分析而談綜合，脫離了事實而談玄妙的「體相」！

林同濟教授有幾句話說得還有點道理「第一期的功績在掃盪千餘年道學面孔的淫威，捧出冷酷的事實來打碎那麟甲千秋的載道設教的老偶像。細驗此中，乃含有一股純理智的精神」。是的，五四初期的學術思潮是貫徹著理性主義的精神的，那就表現為德先生賽先生的呼聲，而林同濟先生所謂第二期的學術思潮也依然是理性主義的。現在林先生想對第一二期來一個反動，那正是想以反理性主義來反抗理性主義。

然而在西方支持着反理性主義思潮的政治勢力已在這世界大變動中日趨於沒落的時候，人們却在東方爲之搖旗吶喊，亦多見其不學無術而已。

五

正因爲我們抗戰不只是爲了戰，更是爲了建國，而在建國工作中，學術文化的建設是最重要的部門之一，所以最近，似乎許多方面都在注意着今日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動向的問題，上舉林同濟先生的話正是其中之一。這問題確是一個遠大宏闊的問題，但是倫明確的把握着整個世界的政治發展的動向和中國政治發展的動向，這問題也不難得到結論。而也正因爲目前整個世界處於最複雜的變化之中，一眼看去，似乎一切都在未定之天，這就鬧昏了許多人的頭腦，在各種問題上做出了荒謬的結論。在這裏，我們不算詳細討論世界與中國的發展動向，但我們可以斷言的是：以世界範圍來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勃發起來而每況愈下的西歐反理性主義思潮已經絕對地沒有出路了，正如它們的支持者在政治上的沒有出路一樣；而在中國，既然從五四以後，在搬運西方的學術東來之際，早曾零碎地帶進了許多反理性主義的出品，卻並不能在國內起多大的作用，那末，在今日，正義的民族解放戰爭正在使全國人民的覺醒與力量飛速提高的時候，更難給反理性主義的學術思潮以任何發展的餘地了。

整個人類將從戰爭的烽煙中獲得理性的充分解放與發揚，中國的學術文化的發展路向也終歸不能不是理性主義的。

這是一條坦蕩的大路，洋溢的長流。然而在大路上有障礙，在長流中有逆流，這種反理性主義的思潮在今日個別地出現是深可注意的事。而其發生的原因也是不難解釋的吧！

逆流是不能永在的。但正因為逆流的存在，我們就更不得不堅持主流的發展。

我們要堅持科學的精神，堅持思想的自由發展，堅持合理的思考，從這裏面培植我們的遠大的理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反對一切盲從和獨斷，打碎一切反理性主義！我們一面要排斥因襲的傳統的成見，一面要排斥西方腐敗思想的傳染，而在民族解放戰爭的發展中充分發揚清醒的現實的、科學的理性主義。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